

## “化身千百 以垂久远”

——读《书海五十年》后感于《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整理、点校的《汪康年师友书札》。《书札》共收七百余家致汪康年函三千多件，约三百万字。从已见到的两卷看，最早在徐花农任广东学政前二十年。汪康年戊戌前后的信件都收藏在上海寓所，辛亥年汪康年心脏病发逝世，他弟弟诒年赴京料理后事，把1905年后在京的信件，扫数携回上海，因而其完整是仅见的。

汪康年是戊戌前后较有影响的人物。他“中岁以后，忧于时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设施，而不获遂其志，不得已始藉报章以发抒其意见”。自1894年绝意仕进，次年进行筹划，迄1911年逝世，先后十六年间尽瘁心力于报业。1896年与梁启超、黄遵宪等创刊《时务报》。尽管他和梁启超政治主张不尽相同，然言论互为表里，收互相呼应之效，使《时务报》风靡海内。又办《时务日报》，后改名《中外日报》，其言论为读书人所重视。1905年他又在北京办《京报》、《言言报》。他和各阶层人士有着广泛联系。加以亲朋互通消息，书牍频繁，《书札》中保存有丰富而重要的材料，有不能为他人道的密件，因而其价值极高。是戊戌前后我国政治、文化、新闻出版，以及社会动态的重要史料之一。

二十年代汪诒年先生编纂、刻印乃兄遗文和年谱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

抗日战争时，诒年先生蛰居上海。1940年叶景揆、张元济、陈陶遗在沪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聘请顾廷龙先生主持馆务，确定收藏范围为保存国学及历史文献。诒年先生与合众发起、董事诸公均极熟悉，因而此项信札捐献给合众图书馆。

汪康年、诒年昆仲志趣相投，诒年曾长

期襄助乃兄。汪康年在鄂、京、沪一切均由乃弟代理，诒年于乃兄活动极熟悉。汪诒年捐赠此项信札前，曾一一编次，并略有注记，为后人阅读提供极大方便。

1953年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财产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又并入上海图书馆。机构虽有变化，该项信札始终得到妥善保管。顾廷龙馆长视这些书札为珍宝，亲自管理、监督装裱成册，以利保藏。为供流通，顾馆长又请人誊录，并一一著录卡片，以供学者查阅、利用。原件出自七百余人，字体行草不一，誊录件均一一经顾老亲自校对。多年来，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的阅览室里，天天可以看到近代史工作者阅读是项誊录件。现在又化身万千，使近代史工作者能人手一份，对近代史研究之贡献是不可轻视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拟于书末另附著者小传和人名索引，亦一大功德。

上海图书馆近年来陆续提供馆藏为出版之用。除述古堂影宋精抄本《集韵》等珍本古籍外，属于近代史料的亦极多。如提供全仿《申报》供影印。名人书札日记方面，除汪康年外，至少有缪荃孙手辑友人手札、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顾廷龙馆长1981年说：“昔黄黎洲言，藏书难，藏久尤难。龙从事图书资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同感，且谓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缩微照相之业日益发展，着徒手采获，即付摄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斯可解黎洲之惑矣！“上图的慷慨，正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思想的再实践。

“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上述缪荃孙亲辑手札，是顾老内兄、著名收藏家潘

承厚1940年底在北平购得，视作珍品。顾老代合众图书馆情商录副，以供流传。原件后来捐赠故宫博物院。由于年久，当年录副已成孤本。再如忘山庐日记，是民初总理孙宝琦胞弟宝瑄所记。日记不仅记载详细，而且绝无隐饰。日记自光绪十九年至光绪末年（1893—1908），虽有间缺，但甲午、戊戌等年无缺失，不失为重要材料，后人视为奇货。1941年秋由叶景揆设法，借到后由顾馆长组织人录副后入藏。从后来叶景揆《卷龛剩稿》看，在解放前孙家已将日记原件丢失。此次排印是根据顾馆长的录副。

图书馆有保存文献的责任，保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用出版的方式即“化身千百”，是保存和利用孤本、手稿最好、最积极的保存方法。多年来对珍稀版本、名家抄、校本的影印一直注意。三十年代的文化刊物和部份苏区报纸有了影印本，近年影印了几份大报。存数极少的几种早期报纸，为尽早影印流通，国家组织了缩微抢救，并已初见成效。至于明清名人手迹，主要是书札，其影印还处在近乎静止的状态，而上海图书馆的慷慨是仅见的。此外近代史所编印了胡适友朋书信。名人手迹中，特别是书信，文献成份很大，而且很多历史秘密也只有依靠信札才能厘清。各大公共馆几乎都有名人手札收藏。但因为这些信札都列入特藏，而现行一切著录，标识办法都无法表达这些信札的具体文献价值，因而读者利用是很困难的。如果能象《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胡适来往书信选》那样整理出版，那么文献保存和利用的问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

这件事做起来有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保藏分散：一个收信人或发信人的信件在很多图书馆里都有收藏而数量都不多，另外皮藏馆的藏品被出版后，它的原件就只剩下文物价值而失掉了文献价值，这是一种牺牲。

解决分散的困难一方面应该尽早组织编

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其它皮藏名人手迹的单位的藏品联合目录，即进行一次藏品调查。广泛调查才能获得充分利用的基本条件。这种调查将是很费时间的。因而另一方面可以先从已经集中的，或比较集中的做起——先组织整理出版。像北京图书馆所藏赵凤昌藏札，共109册，是一份比较完整而未经整理的近代史上的重要材料。赵凤昌在近代史上可说是个神秘的幕后人物，他和各派都有往来，镇压《苏报》案，有他的活动，他幕后活动的“高潮”是武昌起义后和张謇一起策划为袁世凯攫取政权。他个人所形成、保存的文件被称为“赵凤昌藏札”或称“惜阴堂藏札”。其中有来信、来电，有发信、发电留底，有存留他人信电，有起草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他人文章，文件草稿，有抄录的报章重要新闻，等等，是一个数量极大的政治档案。原件在当时的机密性，使得整个藏札成为了解辛亥前后二十年政治派别间纵横捭阖的真相的重要材料，史料价值极高。这份材料始终未加整理，也基本上不为人知。五十年代有两位近代史工作者抄录过，六十年代初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发表了其中极少一部份，此外就很少有人利用过，实在是近代史研究的一大损失。六七年前曾议论过这份藏札的整理方案，因为原件缩微片的静电还原费由谁承担问题没有解决而中止，近有人准备利用五十年代抄件进行整理出版。这并不是明智之举。即使当年过录件毫无错字，有些文字，包括信件，都要辨认笔迹才能判清执笔人和文字的性质，离开了原件或缩微、复印等条件是比较难整理的。

至于因为发表而使收藏馆受到的间接损失，馆员付出的额外劳动，出版者理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名人手迹应更多发挥其文献作用。

读《图书馆学通讯》1987:1 所载吴织同志所撰顾廷龙馆长学术传记，有不能已于言者，作此补充和建议。（汪家熔）